

19.13



順德文史



东

第二十四期

(1991年10月)

9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顺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顺 德 文 史

第二十四期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顺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1年10月

目 录

- 辛亥革命志士黄禅侠
.....黄腾鹏昆仲 (1)
- 顺德籍女作家草明
.....黎尔宽 (34)
- 画坛名家张介事略
.....罗永安 (39)
- 摄影家梁羽泽父子
.....林家强 (48)
- 缅怀先师卢介拔
.....吴基立 (53)
- 蛇医萧毓林轶事
.....梁礼锵 (61)
- 我所知的健德公司
.....李本立 (65)
- 恒聚酱园史迹鳞爪
.....梁礼锵 (86)

辛亥革命志士黄禅侠

黄腾鹏昆仲

先父黄禅侠（1886—1944），字询儒，号蛻庐，广东省顺德县陈村赤花乡人，生于光绪十二年丙戌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886年3月31日）。其祖辈乃官宦之家，世居于广州河南漱珠桥畔兴隆里。祖父黄泽霖，曾两度赴京应考不第遂弃儒就商，不幸早夭，享年仅二十八岁。祖父共有兄弟姐妹十五人，但同胞者仅三人，其余均为同父异母。祖父逝世后家景中落，祖母备受诸异母伯叔欺凌，乃于守制后携吾父及年方五岁的三叔黄容斋回南海县西樵瑚心乡娘家居住（祖母共育三男一女，幼殇其二，只余吾父及三叔）。幸外祖谭氏世业丝绸，尚

可维持生计，祖母亦时作女红，帮补家用。

父亲八岁起随诸舅在私塾读书至十四岁。年虽幼，但聪慧好学，颇有文才，喜咏诗，善书法，爱好绘画、金石及古琴弹奏。他个性刚强、豪爽，不愿长期依赖亲人供养，遂弃学从商，从诸舅走商肆为学徒。十九岁随舅父往越南经商。其时中日之战，满清腐败，割地赔款，外侮与国耻激使革命风云弥漫海内外，也激发起父亲的爱国热忱。适值孙中山先生在越南宣传革命，他有幸亲聆教诲，毅然在河内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此后，渐与胡汉民、黄兴、潘达微、林直勉等革命党人过从甚密。复因有表伯张绶芝为河内华商总会首领之便，父亲遂以越南为据点，往来于越、港、粤、沪之间，为革命奔波不辞劳苦。他曾参与武装起义的筹划，是云南河口之役的领导人之一，亲率战士攻下督办公署，降下满清旗，升起革命党旗帜。河口之役后来虽失败了，但父亲象其他

广大革命志士一样，并无灰心丧志，仍尽己之所能，通过各种途径，继续为实现民主革命的宗旨而奋斗，诚为粤省之民主革命前辈。因而孙中山先生曾亲将自己与夫人宋庆龄在轮船上合影的照片题赠先父，以示嘉许。黄兴先生亦曾亲笔书扇赠先父，表达同志深情。可惜这些珍贵文物均已在战乱年代散失无存。

父亲在越南两年八个月，始于1909年返粤完婚，娶南海县陆宝牲为妻。在家乡仅居月余，即携妻再次南渡。因父亲为革命奔忙，无暇照顾家室，陆氏染病未能及时治疗，不幸病故于宣统二年庚戌九月廿九日（1910年11月1日），终年仅二十一岁，葬于越南河内。后来，父亲由其挚友、同盟会员胡灼立（旅越三水华侨）作伐，娶其妹胡少荷女士，是为我们的亲生母亲。

先父生平任侠好义，志行忠纯。辛亥革命后，唐莫虞（即唐继尧）在云南成立军政府拥

护共和，父亲向河内华侨商界发动义捐餉需，亲自携款赴昆明交唐都督，表示海外侨胞的支持。其后，他重返穗垣任广东省酒税总巡，为革命筹划餉款四处奔走于粤省各地。在潘达微先生的支持和协助下，他主动筹办广州乞儿救济会，收容教养无家可归的广州孤儿及乞童。

1913年，袁世凯窃国，粤督龙济光受命逮捕革命党人，父亲再次出走港、越、沪等地，参加孙中山先生发动的第二次革命。鉴于其时内地尚无一主持正义之报纸，他就在香港创办《真报》（有说他和胡汉民、林焕庭合办），宣传革命，反对帝制，鼓吹共和，讨伐袁世凯。但此革命之喉舌却先后两次横遭港英当局干涉，所有同事前后皆被传讯，或递解出境，或拘押入狱。父亲因改姓名为韩蝉，始得幸免，但仍一日数迁，以避侦探耳目。后又以蛻庐之号，在香港卖花街开设书铺，名为“书画舫”，暗地专售进步报刊和革命书籍。书铺二

楼则为革命党人秘密聚集之地，曾在此筹划过暗杀龙济光、李准等人的行动计划。

1914年，他的挚友林直勉先生在广州湾（现湛江市）因党事暴露，粤督龙济光买通当时统治广州湾的法国殖民地当局将其逮捕，移囚于越南河内监狱。父亲与林之女友紫溟冒险南渡营救。但在河内被反动华人黄健卿所识，唆使法国暗探追捕，只好逃往海防，在同盟会员黄隆生家中暂避，詎料法探又随即跟踪而至，遂被迫避居野外同盛长牛皮厂旬日。后幸得湖北轮蔡浩生先生所助，化装为日本人脱险返回香港。是时，父亲利用居港的合法身份，与邓警亚等创办《时报》和《小说晚报》，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又遭港英当局干涉，两报相继被查封，他亦两次被追捕，幸得友人之助，他设法逃往澳门寄寓于孙眉先生（孙中山之长兄）家中。此时（1915年），祖母谭氏不幸病逝，父亲因国事在身，无法回乡奔丧，只能撰

文表达哀悼之情。1916年，袁氏的“洪宪”丑剧彻底失败后，父亲始结束漂泊海外的生活，得以复履国门。他甫抵广州，即奔象牙峰祖母墓地，抚碑悲泣，痛惜这位爱国的中华妇女之早逝。

父亲生前与蔡锷（蔡松坡）、唐继尧交往甚密。自1911年成立军政府，至1915年12月蔡、唐在云南发起反袁称帝的护国运动，乃至1917年唐表示拥护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护法运动期间，父亲曾多次往昆明献策商议予以支持。他曾鼓励并介绍两广青年和华侨青年投考唐继尧主持的云南讲武堂，以图发展革命军事骨干。护法运动之时，正值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需在云南发展其烟叶生产，开拓产制香烟新途径，发展民族工业。该公司东主简照南先生欲借助父亲在云南政界中的关系，以利于开展公司业务，特邀请父亲出任驻滇经理。而父亲亦想借助其经济实力和地位，对云南政界有所影响；

加以其挚友潘达微先生因“洪宪之变”亡命海外，亦应简之邀，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香港营业部主任，两友同途，实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图强中华之共愿，是以父亲遂于1917年10月入滇就任该职。父亲到职后，广泛联系政界、商界人士，办事公正精明，使公司业务大为发展，因而亦能促使公司为社会慈善事业屡屡捐输巨款，造福当地人群。父亲多方面才能之造就，是同他的勤奋好学分不开的。他鉴于自己青少年时代未有条件入学校深造，故尽量把握各种可利用的时间，博览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各类书籍，并努力学习外文，因而通晓英、法、日等多种外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父亲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通过朋友关系，多方设法在上海购买当时国内翻译的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认真学习研究。他十分喜爱阅读高尔基、鲁迅的文学著

作，亦广泛博览克鲁泡特金、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论著。他在民国十三年五月四日开始撰立的《蛻庐心得语录》的笔记中明确表示，他博览群书，既有修身养性之目的，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想跟上时代发展，开拓思路，适应新的革命形势之所需。可是，政治风云变幻难测，令父亲痛心疾首。先是1921年龙云出任云南省主席，奉行地方割据政策；同时，国民党内部派系分歧和倾轧日益剧烈，父亲对这种局势深感失望。特别是稍后数年，孙中山先生病逝，廖仲恺先生遇刺身亡，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父亲当年的革命同志和挚友诸君大多离政索居于港、穗等地。面对如此急剧的重大事变，父亲完全陷入彷徨、苦闷和痛楚之中，唯有长期借酒消愁。后因饮酒过量，酒精中毒，曾一度造成神经错乱。云南著名高僧虚云和尚同父亲素有深厚交谊，力劝他静坐念佛，修身养性，谢绝一切社交应酬，终于逐步得康愈。此

后，他戒酒茹素，如受佛家之戒，两广同乡多称呼他“和尚”，他亦怡然以此称自居。

自简照南先生逝世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经营渐趋衰微，父亲乃于1928年辞去经理职务，在昆明市正义路自设爱国书店，销售国内外图书报刊，余暇之时则读书写字以自娱。他开办此店之主旨乃普及文化，故所售书刊取价甚廉，因而门庭若市，每日登门阅览者以千百计，社会影响甚大。时值滇越、滇缅交通贸易日渐频繁，两广人士来昆明经商者渐增，其子女尚无适当学校可入。父亲就出面向各方面捐款，与热心诸乡彦携手创办粤侨公学，其后在此基础建办粤秀小学、粤秀中学，不仅为两广乡亲解决子女入学之难，亦为当地增添普及教育之场所。他见同乡中的一些贫弱老人无人照顾，又用捐募方式筹款设立两广同乡疗养基金救济这些人。当时，昆明街道狭窄，木构房屋较多，若一处发生火灾，立即延烧甚广，给市

民带来深重灾难。父亲作为两广同乡会理事，率先在会内倡议创办两广消防队，诸理事遂公推他出面筹建。由于获得旅滇同乡和侨胞的广泛赞助，很快就从国外购置新式消防机车，改变昆明消防设施落后的状况。不少两广同乡自愿充当义务消防队员。每遇火警，两广消防队就迅速赶到现场灌救，灭火效果甚佳。父亲有时亦随车亲往指挥。抗战期间，日寇飞机经常轰炸昆明市区，两广消防队更是不畏艰险及时扑救，其感人事迹广为市民群众称颂。

1933年，广东省政府由邓慕韩先生主持筹建辛亥革命纪念会，向各地搜集有关史料文献。邓与父亲为患难之交，因知他平日积藏史料甚多，遂向他征求，父亲即慨然捐赠。潘达微先生逝世后，所遗广州孤儿教养院院长之职长期悬缺，广东当局曾电邀父亲回粤主持，他因不屑与国民党官僚为伍，故毅然婉拒。1936年父亲为悼念祖母逝世二十周年，特从滇取道

越南经香港回粤，再次往广州象牙峰凭吊祖母谭氏陵墓。同时，在粤探访旧友，哀悼逝者。挚友林直勉生前曾写信向父亲借读一部珍藏书。惜书尚未寄发，林先生即突于1934年8月9日病逝。父得噩耗，哀痛万分，立即撰联书之寄粤以輓。联曰：“问吾辈剩有几人，痛革命尚未成功，噩耗传来，兄胡遽死；与老友别将廿载，悲国难更加严重，边陲伏霉，我愧偷生”。此次回粤，他亲携此书焚拜于林直勉先生墓前以报至友，有如季扎之挂剑。回粤期间，他得悉另一挚友潘达微先生病故后，遗体由香港迁回穗市，附葬于黄花岗已七年，仍未修建陵墓，葬地蔓草荒烟，一坯黄土，无人知悉。父亲撰写《书潘义士葬七十二烈士事》一文，记述潘先生当年不避艰险收殮七十二烈士遗骸安葬于黄花岗之史实，并上书当局，要求迅速为潘建墓。此事一经倡议，即获各方支持，乃由广东当局拨款修建。父亲缅怀先贤之

深情遂终能如愿。此次返粤后回滇途中，父亲顺游上海、南京等地，不少身居高位的旧友，纷纷劝他出任党政要职，父亲皆一笑置之。翌年，父亲又特意撰写《先妣谭孺人事略》，追忆往事，以遗后辈。

抗日战争期间，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竟在昆明宣扬所谓“中日亲善”。父亲有见于此，就书写爱国警句或标语，粘贴在他所开办的爱国书店门口的玻璃窗上或门板上，而且每周变换内容，用以提醒各界人士，激发爱国热情。由于书店位于昆明市正义路中段，地处中心商业繁荣区，过往行人很多，不少群众围观议论，社会影响很大。亲日派视之如眼中钉，竟收买流氓歹徒屡屡恐吓父亲，如说什么：“你近来气色不佳，恐怕死期不远了”，等等。父亲知其所指之意，却毫无惧色地对曰：“我或恐要死，请你先备轿联可也！”简短三言两语，即令歹徒无可奈何。

抗日战争期间，两广同乡从粤桂或缅甸、越南逃难至昆明的日增，父亲同其他旅滇乡彦一起，设法安置，竭尽全力救助，或代觅车辆转送，或介绍工作谋生。甚至曾安排过一些从缅甸逃难回来的乡亲在自己家中暂住，给予生活照顾。与此同时，父亲还倡导两广同乡踊跃捐款，成立施药施棺会，救济难民中的穷苦病患者，收殮埋葬死难者。父亲这种与人为善、致力社会公益事业的精神，深为旅滇两广乡亲和缅、越归侨所崇敬。

父亲旅居昆明二十余年，虽隐身于商界，但洁身自许，深恶追名逐利，视富贵如浮云，因而清贫如故，唯剩下书刊资料数千册，亦已于年前由其子女捐赠给云南省图书馆矣。更难能可贵者，就是他的民族气节与爱国热忱始终一如当年。就在他逝世前一年（1943），父亲同至友黄君牧闲谈时，还特意从书柜拿出陆放翁诗集，翻出陆游《示儿》诗给君牧先生阅

看，而他则情不自禁吟诵“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名句，既是表达对诗人的无限赞佩，又是最深沉的激励自勉。但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疯狂野心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其心情十分复杂、矛盾，因而除诗书自娱外，复又大量借酒消愁。曾自撰一联曰：“毕生有恨留斯蛻，半日偷闲爱此庐”，嵌“蛻庐”二字于联脚，以表其志。他晚年曾多次向君牧先生吐露心声：“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寿命能稍长一些，想亲眼看一看日寇是如何覆灭的，中国是如何富强起来的”。可惜终因嗜酒造成脑溢血症而于1944年2月14日病逝于昆明，葬于昆明西郊金家山。父亲病逝后，昆明各报均以显著位置披露噩耗。滇、渝等地政要、知友闻之无不痛惜，吊唁祭輓者甚众，备极哀荣。同志陈树人、吴尚鹰、冯自由三先生合撰《黄禅侠先生行述》以颂其义，挚友台山